



(官怡杏提供)

# 柴 文學篇



## 第一章 蘇澳鎮文學概述

文學是呈現人類內在心靈狀態和外在行為活動綜合現象的記錄。依據文學產生的原理，自有人類聚居、活動就有文學。因此「蘇澳鎮文學」是從蘇澳鎮這個地方有人居住活動開始即有其文學。史前時代即有文學，史前時代的文學即口傳文學。最早的蘇澳文學，就是已知最早住在這裡的平埔噶瑪蘭族人的口傳文學。

原始時代、初民社會，對渾沌世界懵然無知，充滿恐懼，對大自然的種種現象，對生命，也都一無所知；颶風、洪水、毒蛇、猛獸處處對生命構成威脅，飢餓、疾病帶來死亡的恐懼。透過科學（農技、畜牧、養殖、醫學……）、宗教、哲學的對抗、克服、詮釋，把人從饑餓、疾病、死亡的恐懼、威脅中解救出來，或找到精神上出口的解脫，都需要累積經驗及薪傳智慧，文學就是最好的媒介。口傳文學最常見的詩歌和故事，就是因為具有理想的傳承和詮釋的功能。噶瑪蘭族人在噶瑪蘭平原上生活了數百年、甚至數千年來，走過黑暗、走過蠻荒，必然有其累積生活經驗、知識的方法，以及達成生活智慧薪傳的途徑。不能因為目前的失傳，便否定它的存在。全臺灣的平埔族，都有因 18 世紀以來快速漢化的原因而喪失族語的情形，口語文化急速斷線失傳。噶瑪蘭人口傳文學的失傳，雖然緣由多端，但漢化仍然是重大的口傳文學消失、散失的原因。

17 世紀 20 年代，噶瑪蘭平原屬於西班牙人的勢力範圍，荷蘭人雖曾派兵北上，卻不敵西班牙人，直到 1642 年，西班牙人主動決定撤出北臺灣，荷蘭東印度公司始決意再次派出軍隊，到北臺灣宣示主權。一支由 Piter Boon 隊長率領的 300 名士兵的隊伍，在解決淡水地區的問題後，於 1644 年 9 月 11 日率軍向噶瑪蘭灣進發，至 9 月 30 日，認為已完全招降及征服了噶瑪蘭平原上的所有部落才撤往雞籠。Piter Boon 隊長以「日記」向福爾摩沙公司詳細報告整個征戰及招降的過程，為西元 1640 年代的噶瑪蘭平原留下了稀有的記事，堪稱噶瑪蘭平原最早的文字記述。文中的噶瑪蘭灣，即是蘇澳港。因此，該日記也是最早見的蘇澳文字記事。

1810 年（嘉慶 15 年）4 月，閩浙總督方維甸在〈奏請噶瑪蘭納入版圖狀〉說：「據稱『噶瑪蘭南北約長六、七十里，東西約寬二、三十里不等。漳人四萬兩千五百餘丁，泉人二百五十餘丁，粵人一百四十餘丁，熟番五社、九百九十餘丁，歸化生番三十三社、四千五百五十餘丁。』」<sup>1</sup>雖然熟番加上歸化生番，僅達漢人的十分之一，但畢竟還是噶瑪蘭平原上的第二大族群，何以噶瑪蘭語的口傳文學快速流失？除了平埔族共同的、缺乏對漢文化的強烈的抵抗意識之外，噶瑪蘭平原上多種族現象，恐怕也是主要原因。1684 年（康熙 23 年）纂成的《臺灣府志》<sup>2</sup> 已知噶瑪蘭平原上的平埔番分成 36 社，「蛤

<sup>1</sup> 陳淑均，〈噶瑪蘭廳志〉，卷七〈雜識〉上，紀文上，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年 6 月，頁 332-333。

<sup>2</sup> 指蔣毓英《臺灣府志》。



仔難三十六社番，散處於港之左右，土人謂之平埔番。」蛤仔難是漢人對噶瑪蘭的舊稱，指三貂嶺以南到蘇澳的帶狀地區。亦有作「甲子蘭」（蕭竹友《甲子蘭記》）、「蛤仔欄」（鄭兼才〈上瑟菴生生〉）或「蛤仔蘭」（賽冲阿奏），黃叔瓚、蔣毓英作〈蛤仔難〉，姚瑩、楊廷理、汪志伊都作「噶瑪蘭」。都是因為「番語」之音譯不同，指的都是噶瑪蘭平原。

1722年（康熙61年），因朱一貴事件<sup>3</sup>後，增設巡臺御史，奉派來臺的黃叔瓚說「蛤仔難三十六社」<sup>4</sup>，也具體指出36社之社名。黃叔瓚〈番俗六考〉中的「番」，除了特別強調是「傀儡番」者外，都是平埔族。到了1810年（嘉慶15年）4月，閩浙總督方維甸奏請設廳時，仍說噶瑪蘭僅有熟番5社，歸化生番33社。顯然，清人統治臺灣130多年後，對於整個噶瑪蘭平原族群的了解仍然十分有限。甚至不知道1730年代之後，有彰化縣潘賢文率領岸裡社、阿里史社、阿東社、東螺社、牛罵頭社平埔族人來此開墾，加上10倍於噶瑪蘭先住民的漢族移民。噶瑪蘭住民的生態在此百餘年間，已有重大的混化、融合、變遷，其中語言的流失，最為快速。

1832年（道光12年）出版的《噶瑪蘭志略》，都只提到〈番情〉、〈番俗〉及〈番社〉，都不記「番語」。1953年（民國42年）創修，1965年（民國54年）7月編竣的《宜蘭縣志》〈人民志·山地篇〉，語言方面將之分為南澳族（丕雅汗、哥各朱、庫巴波）與溪頭族（四季、埤南、嗎崙），列出數字、自然界現象、方位、稱謂、身體器官、生理現象之單語字詞147則的6個部落的不同發音，都用漢音譯出。對於噶瑪蘭平原住民語言的保存仍然十分有限。

2002年（民國91年）5月，在「宜蘭縣史系列」計畫下的《宜蘭縣口傳文學》編纂計畫，是口傳文學的採集計畫。該計畫的成果<sup>5</sup>只有一篇〈漢人眼裡的泰雅族〉，並未採集平埔族噶瑪蘭族的口傳文學。在未署名的〈第一篇導論〉中說：「報導人以漢族耆老為優先／我們原先預計要廣收閩南、客家、原住民等宜蘭主要族群的材料，但我們訪問到的平埔族後裔，都使用閩南語，而非該族的母語噶瑪蘭語。泰雅族雖未完全滅絕，但是，受計畫委託居間擔任翻譯的部落牧師或老師與報導人交談時使用的語言，並非泰雅族語，而是部落裡更為普遍的日語。……礙於現實的困難，本計畫不得不暫時排除原住民的部分，將蒐集重點鎖定以閩南、客家為主的漢族耆老。」<sup>6</sup>噶瑪蘭平原上的噶瑪蘭口傳文學，也在蘇澳鎮文學裡缺席。至於噶瑪蘭原住民的泰雅族傳說，自日治時代即有人類學、民俗學者調查、採集，戰後1960年代，亦有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在南澳鄉泰雅族部落，從事採集、研究，今蘇澳鎮境內，不屬於昔日泰雅族人的主要活動領域。

<sup>3</sup> 1721年4月19日，朱一貴邀集52人，在羅漢內門（今高雄市內門區）舉事，抗議鳳山縣令倒行逆施，召集數千人，攻陷鳳山縣城，崗山塘，圍攻府城，自立為中興王，建國號大明。文武官員攜眷逃往澎湖。清廷命藍廷珍渡臺平定，歷時2月。史稱朱一貴事件。

<sup>4</sup> 黃叔瓚，《臺海使槎錄》卷六〈番俗六考〉，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年9月，頁141。

<sup>5</sup> 邱坤良、施如芳、張秀玲、蘭素娟、郝譽翔，《宜蘭縣口傳文學》上、下冊，宜蘭縣政府，2002年5月。

<sup>6</sup> 邱坤良、施如芳、張秀玲、蘭素娟、郝譽翔，《宜蘭縣口傳文學》上、下冊，宜蘭縣政府，2002年5月，頁16。



雖然相傳 1563 年，海盜林道乾曾由澎湖率眾來到蘇澳，並且佔領蘇澳港數月之久，《噶瑪蘭廳志》卷一〈封域〉云：「噶瑪蘭……乃三十六社土番之地，自昔不隸於中華，前明謂之北港，亦謂之東番。相傳嘉靖年末，海寇林道乾曾竄泊蘇澳；實則日本、荷蘭及鄭氏竊據所不及之區也。」<sup>7</sup>在林道乾與日、荷、鄭氏和臺灣發生關係之間，尚有西班牙人亦有多次接觸，不論是西人船員漂流至噶瑪蘭（文獻作蛤仔難）遭人殺害，或西人率軍報復，以及後來（1634 年）佔有臺灣北部時，在蘇澳港口建有 2 處小教堂，也都只是零星之記載。

清國入主臺灣後，於 1684 年（康熙 23 年）噶瑪蘭納入版圖，劃歸諸羅縣轄，鞭長莫及，噶瑪蘭仍在「所不及之區」。史記亦有「自康熙三十四年間，社番始輸餉於諸羅。」<sup>8</sup>之記事。不但都與文教無關，而且此一時期，噶瑪蘭地區仍不斷有墾民或漂流來此的官兵被殺害事件，清政權並未掌控此一區域。1787 年（乾隆 52 年）漳州人吳沙入墾噶瑪蘭平原，漢人墾民始在此立定腳跟。1723 年（雍正元年），增設彰化縣、淡水廳，噶瑪蘭隸屬淡水廳。距行政中心的距離縮短了，還是文教不及的化外。因此，「至嘉慶十五年庚午四月收入版圖，譯蛤仔難為噶瑪蘭。」<sup>9</sup>兩年後，設民番糧捕通判、縣丞、司巡檢等文武官員，隨著部份能詩能文、愛詩愛文的文武官員的入駐，漢語文言及其文學正式進入噶瑪蘭平原。

奏請將噶瑪蘭收入清國版圖的閩浙總督方維甸，負責勘查開蘭事宜的閩浙總督汪志伊，籌議噶瑪蘭定制的臺澎道姚瑩，噶瑪蘭首任通判楊廷理，諸羅縣教諭謝金鑾等人為「開蘭事宜」所寫下的奏疏、勘查報告，以及詩文，可以說是開啟噶瑪蘭漢語文言書寫最早的一批文學文獻。此外就是少數遊客留下的遊記。楊廷理出任噶瑪蘭通判期間「1810 年（嘉慶 15 年）4 月至 1812 年（嘉慶 17 年）12 月」，創設仰山書院。為噶瑪蘭平原最早培育漢語文言人才的機構。「庠序以培養乎人才也，而書院即以輔成乎庠序……」<sup>10</sup>庠序才是正軌的人才培育機構。噶瑪蘭設治之初，未建專學，比照澎湖廳的情形，「附試於淡水」。「蘭屬文童生，自嘉慶二十二年奏文准附入淡水廳考試。續又奉仿照澎湖廳例，每屆酌進一名，仍附淡水廳學辦理。」<sup>11</sup>原本淡水與彰化合試，並沒有保障名額，淡水廳學成立之後，才有此一名「撥定」名額。1835 年（道光 15 年）曾短暫就任噶瑪蘭廳通判的柯培元，曾經向臺灣道府為噶瑪蘭的「學校」陳情，云：「竊惟人文不囿於山川，而士氣端資於培植。」<sup>12</sup>他說，後山的開發雖然遲晚，但 1815 年（嘉慶 20 年）的廳判翟淦就曾經奏稱，地雖初闢，但墾民都是從淡水、嘉義、彰化等地遷來，「隨其父兄契家入山，延師課訓。內查有應童子試者五十六名，初學作文者八十四名。」<sup>13</sup>翟淦請比照澎湖廳的例子「歸入蘭廳開考」，卻因適時淡水設專學，僅在 2 年後，准照澎湖廳之前例，在淡水廳試保障一名。柯培元認為：仰山書院，20 年來「按期考課」入書院肄業者陸續已有 240 餘名，不入書院而遠鄉教讀者約有 40 至 50 名，又有初學詩文、漸

<sup>7</sup> 陳淑均，《噶瑪蘭廳志》卷一〈封域〉、建置，（1832），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年 6 月，頁 3。

<sup>8</sup> 陳淑均，《噶瑪蘭廳志》卷一〈封域〉、建置，（1832），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年 6 月，頁 3。

<sup>9</sup> 陳淑均，《噶瑪蘭廳志》卷一〈封域〉、建置，（1832），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年 6 月，頁 3。

<sup>10</sup> 陳淑均，《噶瑪蘭廳志》卷四上〈學校〉，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年 6 月，頁 139。

<sup>11</sup> 柯培元，《噶瑪蘭志略》卷七〈學校志〉，（1837），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年 6 月，頁 63。

<sup>12</sup> 柯培元，《噶瑪蘭志略》卷七〈學校志〉，（1837），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年 6 月，頁 63。

<sup>13</sup> 柯培元，《噶瑪蘭志略》卷七〈學校志〉，（1837），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年 6 月，頁 63。



可應試者約 70 至 80 名不計外，蘭屬童生現有 380 餘名，比淡水歷屆只有百餘左右，蘭廳開考的資格實在綽綽有餘。可是因為名額的限制及交通之不便，每年只有 20 至 30 人到淡廳赴試，其他有人以「祖籍」到嘉義、彰化縣應試。何況，澎湖僅 50、60 名考生即「歸廳考試」、「錄附臺灣縣送府轉道，半帆即可抵郡。而噶瑪蘭附淡廳考試，往返程途十三、四站，至府則千餘里，往返二十六日，……又查淡水設學時，童生赴彰化縣試，不另限額，合取進十三名，往返四程而已。」<sup>14</sup> 蘭廳附設淡廳，只有一個名額。一直到 1840 年（道光 20 年），始獲准「由廳開考」，錄進 3 名。雖然這是針對科舉考試的公平性發言，而且科舉考試的漢語文言學習環境條件之優劣，並不與漢語文言文學之發達與否，有直接的相關，但沒有漢語文言學習的基礎，也就沒有漢語文言文學。

臺灣自明鄭時代輸入漢語文言文學，但能創作的，僅限於隨著明鄭遷入臺灣的流寓文人，如沈光文、盧若騰、王忠孝等，也未建立傳習的機制，談不上為漢語文言文學播種。清國入主臺灣後，仿照其國內建置，府縣設學官，設書院及推行科舉制度，大約經過 30、40 年後才逐漸有本土出生的漢語文言文學的創作者出現。在這之前，活躍於臺灣漢語文言文學領域的，都是來臺任官或旅遊的宦遊文人。

噶瑪蘭雖建置較晚，但 1868 年（同治 7 年），已出現第一位進士楊士芳。1875 年（光緒元年），李望洋進士及第。另有舉人黃纘緒（1840 年、道光 20 年恩科）、李春華（1851 年、咸豐元年恩科）、林步瀛（1862 年、同治元年恩科）、李春波（1859 年、咸豐 9 年恩科）、林師洙（1870 年、同治 9 年附生）、拔貢黃學海（1837 年、道光 17 年）、李逢時（1861 年、咸豐 11 年），恩貢林超英（1819 年、嘉慶 24 年）、江有章（1860 年、咸豐 10 年），歲貢黃鏘（1850 年、道光 30 年），也算是濟濟多士、聯翩秀出了。因此，清治時代的噶瑪蘭文學，除了宦遊文人的作品之外，也在建置後的 30 年左右，陸續出現本地文人的作品。

漢語文言文學在進入日治時期，雖然失去科舉考試的誘因，但因為舊時代的文人，不論是延續漢語文言文學或漢文化之傳統，還是為自己的漢學專長找出路，有大量的漢書房崛起，甚而組成詩社、吟社，以延續漢文學香火。譬如，舊時代的仰山書院，在日治時代就結成仰山吟社，聚集雅好風雅之士，綿延漢語文言文學香火。蘇澳的港市及海景，是清治已降文人雅士吟哦不絕的題材。

1796 年（嘉慶元年），吳沙率眾至噶瑪蘭開墾，由於原住民的抵抗，以及發生漳泉械鬥的問題，墾拓進度緩慢，1802 年（嘉慶 7 年）才發展至今宜蘭市。今羅東、冬山、蘇澳沿山地帶及馬賽海邊的開墾，則是由西部中臺灣牛罵頭、沙轆、大肚、阿里史等社平埔族東移的族人進行開墾。漢族移民與平埔族移民，以及噶瑪蘭原住民族，在噶瑪蘭平原上合唱合奏的生活樂章，大部分僅以民間文學的形式被記載下來。200 年來，蘇澳人的生活故事，有很大的部分，是這個大樂章的一部分。但也一定有屬於蘇澳人特有的，現在已很難清楚地予以釐清。蘇澳的民間文學有閩客、漳泉、漢原、蘇澳和噶瑪蘭等多重、重疊、交錯的複雜組成元素，

<sup>14</sup> 柯培元，《噶瑪蘭志略》卷七〈學校志〉，（1837），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年 6 月，頁 64。

正反映出蘇澳生活的現狀，也不必認真釐清。

1920年（大正9年），留學日本的臺灣留學生在東京發起成立「新民會」展開新文化運動，也掀起了臺灣新文學運動。新文學指的是有靈魂的文學，能反映社會，參與社會現實的文學是關懷現實的文學。新民會的組織很快便獲得島內知識分子的響應，由宜蘭出生的醫生蔣渭水領銜，於1921年（大正10年）10月，在臺北成立「臺灣文化協會」，也是以「提昇臺灣文化為宗旨」。由此展開的臺灣新文學運動，雖然沒有出現著名的蘇澳或宜蘭作家，但有蔣渭水的參與，宜蘭人並未在臺灣新文學運動中缺席。戰後，接收政權以及1949年（民國38年）遷臺的國民政府帶來「中國文學」及「反共文學」，縣境之內亦有新住民作家為箇中翹楚，宜蘭作家李榮春（1914—1994）雖為文壇孤鳥，生前僅發表一部長篇及少數短篇作品，也只與少數的《文友通訊》的文友如鍾肇政、廖清秀、鍾理和等書信返還，其餘時間都只默默地在蘭陽平原耕耘，身後卻留下數百萬字作品，堪稱戰後臺灣新文學在蘭陽平原上的一朵奇葩。

戰後1949年（民國38年）出生於蘇澳的邱坤良，是學者也是作家。作品有傳統戲曲、民俗曲藝、劇場等學術研究專著，亦有散文、報導文學、傳記等方面的創作，是戰後蘇澳文學的代表。另有繪畫、小說創作雙棲的邱亞才、蘇澳媳婦吳小枚的蘇澳人文、地景的深度報導，及慧星般乍現文壇的張清志，都有傑出的作品。

